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8.01.010

· 语言学研究 ·

现状与关键：论语言对文学精神的建构

吴青科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当今文学呈现出两种基本特征: 一是激进的文学精神仍在继承延续; 一是在新的文化境遇中, 呈现出去特征化、娱乐化的逃离现象。某种意义上, 文学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自我的离场, 文学创作、评价活动游离文学之外, 从而使得文学观念及评价体系发生偏移。基于文学整体性现状考察, 预见文学面临某种潜在的精神危机, 进而重申语言表达对于文学精神建构的关键性。

关键词: 激进; 逃离; 语言; 理性; 建构

中图分类号: I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8)01-0082-08

一、文学精神的整体性回顾

当今文学呈现出普遍的“狂野”化的现象, 相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 其意义价值的导向倾向于外部延伸, 发生在文学场域的这一现象不能仅视为偶然性的现象。某种意义上, 它是当前文学本质内部蜕变的某种显像化, 涉及文学与非文学领域的交互性影响, 文学产生的整体性文化背景以及文学传播影响的媒介变化等。这一现象同样意味着, 在大文化背景下, 审视文学的视野预示着新的变革, 其范围涵盖整个涉文学的全过程。如果说以往的文学更多地关乎自身, 如今的文学将面临某种潜在的危机与挑战, 这一潜在的危机与挑战成为本文探讨的直接动因。不可否认, 文学已进入“富营养化”阶段, 如同人类文化本身, 正呈现出“去特征化”趋势。“今天, 自从人们把精神创造总结成文化, 并使其中性化以后, 审美的野蛮特性就使那些能够对精神创造造成威胁的因素荡然无存了。”^①具体表现为: (一) 主体的过度介入与阐释; (二) 语言角色及作用的缺失; (三) 主体与文本的暧昧性矛盾(主客体之间缺乏清晰的独立性, 相互之间的依赖和逃避); (四) 创作主体的对文本空间的“伪虔诚”侵蚀。

(一) 文学的“革命性”立场

无论创作活动、文学评价活动还是文学精神的延续, 主体性的人与客观文本持续存在某种隐秘的对立关系, 姑且将这一对立关系的源动力命名为文学的“革命性”, “革命”即激进, 带有冲动、渗透、改变、霸占的属性, 以各种维度存活于主体与客体之中。通过近现代文学史的粗略考察不难发现, “革命性”立场和价值观始终深度影响着文学的发展, 明显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后期

收稿日期: 2016-12-10

作者简介: 吴青科,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 [德]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安道尔诺著:《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第118页。

又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强大助力。可以说，“革命性”的立场和价值观，不仅意味着传统文学审美精神的跌落，成为当代文学审美精神、评价体系的内在依据，同时使得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形象遭遇深刻的质疑。^①文学思潮的更替、作品的审美内涵以及载体媒介等无形中受到影响。革命即启蒙（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之启蒙）。“模仿基督的行为战胜了自我持存的努力。献身之爱失去了天真朴素的天性，并且从自然之爱中分离出来，被确定为一种功德。”^②所以说某种意义上，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基本属于“革命”的精神谱系。与之相伴生、相对立的两种现象是：一方面客观性的文本被明确“隔离”，未能真正进入大家的视野，唯一发生过动摇的一个现象是西方文艺思潮的介入，促使人们开始用心思考文本的内在价值体系。即便如此，也从未凌驾于主体性的精神价值体系；一方面与所谓的文学的“革命”性立场相对应，文学的“娱乐”性特征渐渐凸显，此类作家作品同样在当今文学场域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整体而言，“革命性”“娱乐性”成为文学的两种辩证的精神特征，两者既明显对立又相互依赖，互为彰显，互为叛逆。在广大的“文学”定义的笼罩下，掩藏着这样两种强劲的暗流，基本可以定义当今文学整体性状况。那么，一系列问题隐患就潜伏下来了，诸如：传统文学观念是以某种形式被继承延续的，西方文论引入的意义与效应，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与文学内部因素的辩证问题以及文学性、文化性……等等。

通过考察文学史，宏观到历史政治性的文学题材，微观到文学精神的发展与延续，即便遭遇与传统审美精神的割裂以及外部力量的介入，某种内在于文学的革命性力量并未消逝，而是进入了潜伏状态，仍旧极为强劲地流动着。综合而言，文学的革命性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显著鲜明的革命性主题、丰富多样的革命性人物角色、文本语言的革命性。革命性主题已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主流意识形态鲜明的主题作品；丰富多样的革命性人物角色则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正义性的强者，此类角色多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另一种则为间接性、病态性弱者——弱者的遭遇来反衬革命性的必要。

需要保持清醒予以确认的是文学的“革命性”与“反革命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不怀疑，从新文化运动发展至今，中国文学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是未完成的，仍旧处于激进的运动状态，尽管变革力量及效果是明显的。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新文学的内在精神在否定传统审美精神的同时，并未形成完整的具有典型特征与丰富内涵的现代文学精神。甚至某种程度上，中国新文学的精神仍旧处于漂泊不定的流浪状态，并且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流浪状态，并据此达到占据传统的目的，无论文学创作、文学评论都遭遇这样的局面。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精神坐标的迷失。具体表现是，创作以及评价活动惯用一种“置换”的伎俩，最明显的特征是，以作品人为的主题以及表象的叙述特征为掩护，从事对文学主体的“剥削”以及对文学精神的“置换”，以致对创作评价惯性地停留在含糊不清的某个层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承认这种“置换”的客观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创作和评价行为。出于对“话语霸权”的占有欲，创作者、评论家与读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挑战话语霸权的实力，作品与世界遭遇缺场，被轻易忽略、冷落。

这样发展下去就产生了新的问题，逃避的文学或文学的逃避无疑将面对残酷的现实，于是需要大胆地提出疑问：我们想要的理想文学到底是何等面目，如何去塑造、维护、继承这种理想化的文学精神。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将如何实现蜕变。这些疑问恐怕都将指向中国文学的“革命性”激进立场和价值观。所以迎接中国未来文学挑战首当其冲的将是文学自身的“伪善”与

① 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② [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安道尔诺著：《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滑落”。事实证明,文学试图在意识形态、思想主题以及表述方式等方面实现蜕变时,往往出现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浑浊状态,即革命与反革命精神的相互敌对、相互依赖。因此,中国传统文学在内在精神上是极端的或者是妥协的,似乎并未找到可供永久驻留的场域。小到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人物,大到颇具蛊惑性的文学思潮,这些原旨“反抗压迫,表达不满”的文学现象最终成为自己反抗与不满的的矢,“自身成长为自己的敌人”并始终无法摆脱幽灵般的恐惧阴影。“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似乎是个可疑的命题”。^①甚至可以更为大胆地预言,文学作为审美性的意识形态产物,其自身的属性是否已被真正认知或界定清晰,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是否存有割裂的可能,与纯粹的审美功能相比,其他功能是否更值得重视与探讨,“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到底有多大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将由文学具体的生存状态所激发。一个明显的情况是,文学对“话语权”的高度依赖,以及“话语权”对文学的暗中掌控,在当今媒介、虚拟空间高度发达的时代愈演愈烈。“纯文学”概念基本成为理念性的抽象符号。

(二) 文学的“娱乐性”逃离

娱乐化成为文学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发生在文学场域中的娱乐化现象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主题的娱乐化。在主题表现方面,呈现出“弱化”与“消隐”的趋势,尤其在处理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娱乐化”现象同时引发了创作者这一群体的内部动荡,一部分创作者秉承文学的介入功能,贯彻文学对社会、政治、人性等的批判功能,此类创作者大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与知名度,大都受到以往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显示出霸占文坛的强大野心(尽管很多情况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部分创作群体仍在大张旗鼓地鼓吹张扬自身所熟识、擅长的审美方式以及文学口号;另一部分创作群体则开始忽略文学的介入功能,更加倾向弘扬文学的私人化功能,文学一定意义上成为暧昧性的意识形态符号,不约而同地从外部世界转移至文学内部。事实上,创作群体自身内部亦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自我的更新蜕变,甚至速度快到惊人,这一切似乎都与文学的“娱乐性”紧密关联;二是叙述方式的娱乐化。随着文学介入功能的弱化,创作行为出现了逃逸现象,创作在其本质上演绎成纯粹的私人性的行为,其实际意义悬浮于现实之上,文学再度成为“奢华”的悬浮物。这一现象一方面与文学思潮的停滞、混溶有关,在继续发展上遇到某种瓶颈和困难,处于长时期的盘旋状态;一方面与现实社会的“同质化”有关,催生文学的“特殊性”,社会背景渐渐趋向同一,审美体验的多样与丰富亦由外向内转移,更加依赖于情感体验的敏锐,创作行为的敏捷,对文学的评价也更倾向于纯粹的写作行为,文学再度成为单纯的书写行为。与之伴生的一个现象是,文学的评价行为却反其道而行之,似乎无法忘却或摆脱诸种强大理论的控制,凭借发达的媒介载体,企图在单纯的文本里发掘出种种“丰富”的审美的、批判的意义,“‘媒体批评’通常扮演了娱乐主题的拥趸”。^②因此,从此种意义上来说,创作行为与评论行为的相互作用不仅仅发生在良性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文学的娱乐性立场和价值观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与评论行为的“娱乐化”不无关系,两者共同促成了文学娱乐化现象。三是文学立场的娱乐化。纵观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史,文学立场有着明显的多维变革轨迹,功能性的、审美性的、思想性的等等,如今文学立场变得不再足够清晰,即便旗帜鲜明地宣扬某种立场,却难以获得足够的信任和力量,这与文学的大众化分不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生存状态值得认真思考,文学成为共性的普遍存在,“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对立明显削弱,对立成为个人与世界、个人与内心的对立,势均力敌的局面被打破,文学原有的立场随之发生变化,私人性的书写行为取代了鲜明的立场,主体的娱乐化就此而生。与此同时,这一现象背

^① 刘小新:《对话与阐释:刘小新选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② 南帆:《传媒与娱乐霸权》,《深圳特区报》2012年12月13日,第B04版。

后将预示着两种契机，一是文学商业化功能的进一步强化，一是文学开始尝试复归文本自身。文学原有的强大而复杂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单一，也越来越清晰。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的空前繁荣是商业化功能强化的明显标志。对文学的评价更多地聚焦于文本自身，针对客观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现象也将成为一种可能，这是文学逐渐复归的表征。这一表征意味着文学自身的功能性力量的大幅度削弱，即人们赋予文学的种种期待将难以实现，需要更多地借助其他手段予以强化，如高度发达的传媒手段。文学开始变得具有脆弱而更有依赖性。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再繁荣很难再依托诸种文艺思潮，那么，针对文学自身的重新而深入的再思考将成为一种新的必要，无论对创作行为还是评价行为而言。

二、文学精神的建构

跨文化研究的普遍趋势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实际上通过理论这一风向标反作用于文学创作本身。单纯的文学评价现象早已过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中甚至并未被真正重视，这一点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评价现象迥然不同，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活动往往视同一种单纯的文学行为。事实上，文学评价往往立足于文学之外的诸多场域，创作行为只是考察文学多维空间的一种维度，经常性地与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混合而谈，并借助非文学的属性而实现自身的评价，这里面亦普遍存在“转移”的现象，使得文学的概念被无限放大，文学创作行为的意义变得单一。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随着文化传播交流的发达，创造性活动变得更为广泛，书写行为演变成为普遍性一般性文化行为，之前的有关创作的定义被无形中重新书写界定，继而自身的功能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仅是审美意志的纯粹表达，更多的是思想意识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立体型表达，这一点对文学创作行为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仅就文学评价而言，在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现象的评价时，创作行为或许仅仅只是基本性的考察，不再深受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属性的“苛刻”拘束，相比而言，非文学的阐述特征反而成为评价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这样一种超越文学场域的革命一方面是文化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是今天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变革的力量只能发生在文学之外，随之而来的一个宏大问题就是，文学接下来将往哪里去。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都将面临这样的困难局面，且文学创作由于深受理论背景的大规模笼罩与牵制，将面临更加苦难的局面，如以往那样由文学创作行为反哺理论建构的场景将很难再现。某种意义上，文学偏离了自我的本体，成为失重的幻影。可以预见的后果是，文学将在某种程度上沦落为一种普遍性的书写行为，而不再是复杂深奥的审美意识形态。这将涉及到本文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即传统意义上文学写作精神的重新建构，以及尝试探索重新建构的建设性策略。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两个重点是，讨论的核心问题首先是文学写作本身的建构，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行为和现象，其次是基于当前的整体性背景尝试理论性的建构，某种意义上亦属于一种历时性的话题。

（一）写作的现状分析

前文已提到，文学事业的“繁荣”带动了文学内涵的大幅度扩张，文学自身的理想性概念以及具体性实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最显著的一点乃是文学创作行为面临解构的危机。文学事业的繁荣与扩张或许意味着其地位与影响力的衰退，文学与人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再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现象早已鲜明地呈现出来了。“自我的特性，就是由社会支配的垄断商品；它总是虚假地表现成自然的东西。”^① 文才子魅力的消弱、稿酬的贬值、创作行为某种程度沦为书写行为、文学与商业的联袂等

^① [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安道尔诺著：《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等,无一不是文学面临“危机”的征候,此类诸多现象已经被文化学者、批评家们广为研究了。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当下文学审美性的分析,继而重新思考文学审美与意义的双重性。事实上,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已经成为文学老生常谈的概念性属性了,针对文学讨论的热点更多地集中在与文学相关的非文学性内容,这些内容甚至背离了基本的审美意义。这一点从看待文学的世界性眼光也可以得到证实,优秀的文学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单纯就写作行为本身赋予文学的东西来界定评价了,更多的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角度予以认定,至少可以说,目前这是评价文学的某种显著的风向标。造成的直接性后果就是,文学的身份认定发生了多重性意义重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表达不再是具体的可预想的,而是一种广泛的没有具体边际的模糊场域,作家、读者、评论家将自身一次性投入到这个模糊场域中,很难再认清有关文学活动的真相。曾经文学因此而被提升、被深化,如今文学亦因此而陷入困境。为能更好地分析本论文的焦点问题,接下来有必要详细探讨涉及写作现象的两种关系:一是审美与世界的关系;一是语言与写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完成本文阐述的预定目的。

(二) 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从事文学创作这一行为过程中,自始至终最需要引起重视并须谨慎处理的关系当属审美与世界关系。进一步讲,看待、讨论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本质上乃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待审美的态度,两者之间又天然地容易产生情感体验的间性,因此,审美的表达成为弥补这一间性的良好手段。事实上,人们对待世界以及审美容易产生某种误解,这种误解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的内心,进而影响人与世界的关系。文学创作本质上乃是对世界体悟的模仿,人本身亦在这一世界体悟中实现自我的持存,“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①在运行机制上,两者之间应始终维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反映在写作语言上同样如此,再现为一整套复杂、精细、清晰的写作建构的网络。因此,审美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乃是语言与写作的关系,后者是前者显性的具体呈现。这种关系同样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那里寻找到类似的结论,即道与器的辩证关系。这样的关系又意味着文学始终将是感性呈现的审美,显示为语言时,又呈现为具体、生动、鲜艳而丰富的修辞运用。可以总结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体系的建构,本质上表现的仍旧是人对世界的直接性的体验。世界体验的疏离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审美体验、审美评价以及文学写作行为,文学的审美体验开始走向两种极端,表达的过度抽象和知觉的无感、执着的保守与怅惘般的流浪。创作者关注的焦点偏离原初性的世界体验,而执迷于世俗意义的拷问,从根本上忽略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将文学之道视为抽象而无穷尽之物。反映在语言层面上,乃是对整套语言系统的破坏与改造,语言在文学的地位沦为单一而无意义的表述工具,具体表现为辞藻的华丽(不确定性)、语言格式的消除、叙述的无目的性等等。

文学发展到今天或许意味着审美与世界的关系出现某种潜在的变革,这一点从文学思潮运动的转向隐约可以察觉到。“旧文学”与“新文学”、改革开放前后以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阶段,文学自身属性以及外部关系都不自觉地进行着调整,以能够与整体的人类文化进行互动。若从整体性体验的角度进行考察,两者关系的变革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旧文学”的纯粹审美观,审美与意识形态各自具有明确的定性,互不相缠绕;“新文学”中审美与意识形态并存局面,审美的地位有所下降,意识形态表达在某段时期成为文学的主要功能,但两者的关系仍旧处理得相对分明,文学仍旧持守传统意义,变革更多是功能性的变革;全球化背景时期的文学,即当今的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没有十分鲜明的评价标准与体系,往往合二为一地进行考察。继而,整个文学的状貌、内部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味着文学原本的特征性存在方式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5页。

有所改变。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文学评价行为已经很少甚至无法单纯从审美的角度（修辞、叙述、意境等）展开评价，文艺思潮、意识形态、社会介入等遭遇麻木停滞的困境——不排除仍存在垂死挣扎，企图挽救已经缔造成功的昔日的“文学帝国”这样的现象——甚至，当今的文学仍旧迷恋过去的革命式的辉煌，并企图重新占领意识形态制高点。不过，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迷恋终将成为文学继续发展的负担，成为难以医治、有必要割舍的痛症。这标志着文学正进入史无前例的“混沌”的去特征化生存境遇，从至高无上的审美崇高沦为混沌意志的表达。即便如此，背后仍旧受到世界主流意识的影响与控制，文学与世俗社会、人为政治永远无法彻底分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有朝一日文学真正疲倦了怎么办，新鲜的文学被陈腐平庸的病菌蚕食了怎么办，文学现象滞后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难以大放异彩，成为对世界表达的模仿怎么办，这一切现象恐怕都有可能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毋庸置疑的是，文学的力量，无论审美或者介入的力量，都已经在某种程度地消弱，换句话说，文学对世界庞大文化体系而言，不再如以往那样标榜得如此重要，某种意义上而言，成为无关紧要的私人性的不对称表达，总之，当今的文学面临困境，需要某种实质性的质疑与转向。

（三）语言的重新觉醒

文学本质的进取力量，客观上要求在现有局面中实现自我的突破，且突破的手段需要排除潜在的模糊性，明确而细致地实现自我的突破。在此之前需要清醒的一点是，传统的纯粹依靠唯美手段以及彻底的介入手段都显得苍老而陈旧，已难以再度唤醒文学的强大生命力。前者显得保守而缺乏创作力，后者显得鲁莽而过于激情。细究下去，根本原因在于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与以往文学对现实进行密切而充实的观照不同，如今文学似乎难以全面而深刻地把握现实社会的本质面貌，在多元多维的现实面前缺乏足够的功能自信，一方面不甘心超脱其上，沉醉于传统而典型的形态，一方面冲动地予以强势介入，企图用文学的力量去捕捉、驾驭瞬息万变的现实。这是当前最为显著的两种文学现象。注定了有一个基本的文学事实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迷茫彷徨的时域，迫不得已以一种自我陶醉、自我蒙蔽、自我转移的方式挽回自我的尊严，并相互之间进行不切实际地支持与评价。这一真实的文学现状，无形中寄寓了某种再度变革的必然趋势。不过，与历史上变革的文学不同，变革的力量或许并不在文学之外，恰在文学自身内部。文学需要恢复深刻的理性。“盖理性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除了无所私的情感（Impersonal Feeling）——这便是理性。”^①对于文学而言，这理性就在于“语言”自身。文学的迷失从语言开始，文学自身的觉醒与持续开拓同样需要从语言觉醒。“语言永远介入，像是一个调节者，特别在形象系统中。”^②语言本身具有双重性意义，一方面从文学生成的物理性考察，语言是文学产生的原始性构成，基于语言本身的属性，文学语言的生成方有了明晰的科学理性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自身的优化，“对于文学而言，语言无疑是这种推广的有力工具——这是一个四通八达地贯穿于各个社会角落的符号系统”。^③语言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均与此紧密关联；另一方面是，从语言外延角度看，文学传统的审美意义更多地与语言这一要素有关，无论从外部形势以及内在含义方面均是如此。因此，若对文学进行某种崭新且卓有成效的反思，很大程度上需要重视并考察“语言”这一关键词的重要而丰富的意义，基于“语言”的机理再进行外延的适度探索，从而避免文学陷入毫无边际的虚无性的定义。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

② [法]罗兰·巴尔特著：《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③ 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文学批评手册》//《南帆文集》1，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页。

三、语言功能的再阐释

上述有关语言在文学场域中扮演的角色解析,恐怕很难被轻易理解接受,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偏离实际的保守主义的、形式主义死灰复燃的主张,将重提语言的功能与作用看作一种认识、观念退化的表现。对于这样一种貌似合理的辩驳只需提出一种宏观的可质疑的文学现实,某种意义上,这种质疑甚至带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力量。即:若从语言的角度重新认真去审视,那些“公认”的好的文学恐怕会漏洞百出,甚至不堪文学之名义的负担。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努力营造的外在于文学文本的复杂氛围蛊惑了读者,通过文本多重的新奇性(叙述手法、审美角度、思想意识以及故事性等)掩盖了语言上的天生缺陷,从根本上丧失了文学表述应有的理性。当然,这与整体的文学评价机制、意义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在这样一个主流趋势影响下,创作者更多地将心思用在非语言层面属性的挖掘之上,企图让文学无限制地介入各个场域,并在其中引燃核爆,至于基于语言角度重视文本自身则被创作者们所遗忘忽略。这样就引发一种对文学现状的思考。文学对生活的阐释与介入是否已经脱离了文学自身,成为创作者孤立的无根性的抽象臆想,无形中将文学给遗弃了。换个角度来讲,对于文学寄寓意义以及介入功能过于执着的现象,若从文学原始的意义来讲,已经脱离的文学本身,成为另一种被创造出来的“自我的文学”。一个很显著的现象是,传统文学“才气”“性情”等文学维度将无法对之进行衡量,从传统文学的角度审视,目前很多公认的文学作品是失败的,甚至不成其为文学的。真实的情况是,作品自身蕴含的审美能量以及读者群体的审美体验,无论考察的维度如何多样与新奇,是否超越文学的界限,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其根本的立足点、最原始的生命力仍旧与语言息息相关,无法超脱语言自身的意义范畴。能够引发读者内心阅读体验的直接动力终究来自于语言本身,这是一种值得认真思考的复杂深奥的事实。文本生成的原始机制以及阅读体验作为文学的两种不同的结构层次,二者的关系无法割裂开来,无论从哪种层次来考察,审美之意志都会无形中蔓延到另一个层次。

(一) 语言与意义的同构

考察文学作品时,对文本意义的审阅不能仅仅停留于作者赋予的层面,即认为意义是作者赋予文本的,这样的由外向内的审阅程序并不符合审美活动的真实轨迹。语言学已经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真相,一个很明显的贡献就是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上实现了突破,对两者的认识不再停留在静止的层面,即语言与意义存在某种内在的互动关系及结构的相似性,这一点类似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的认识。语言的原始生命力——从语言的起源的角度考察,其缘于最初的社会活动领域——从根本上赋予了文本的意义内涵,因此实现文学与世界关系沟通的真正媒介并非作者的主观意志以及读者的人为解读,而是语言本身。“言语同时是个体领域和社会(主体之间)领域的表现”。^①写作的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严重割裂或混淆了语言与意义的辩证关系。对意义介入较为成功的作品的评价更能凸显出这一弊端,将文本的一切成就归属于作者本人的功劳。然而真相是,作者在从事语言组织的所谓创作的过程,本质乃是挖掘语言自身的原始意义领域,即实现语言自身理性的能动,即便作者本人由于某种意识的惯性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以致语言天生具有的意义丰富性无形中转嫁给了语言之外的意识主体,甚至被认为是意义成就语言本身。

事实上,如果某个文学作品,小说、诗歌等被认为在审美表达上是成功的,为广大读者普遍接受,并经受住了审美经验的考验,那么它很有可能捕捉到了语言理性的影子,实现了语言和意义两个层次的畅通,而不能误认为是纯粹意义层面的独善阐释,更不能将文学评价的重心仅仅寄托在社会介

^① [美]罗曼·雅柯布森著:《雅柯布森文集》,钱军选编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页。

人的意义之上，这反而犯了一个明显的基本的错误。评价文学作品的正常的程序乃是，从语言组织的理性结构层面过渡到审美意义生成的层面，这也是写作重新建构的关键环节，即写作活动应立足于语言表达的层面。

（二）语言即意义

无法被误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文学的审美乃是文本语言的审美，但凡超越传统文学批评的思潮，归根结底都是受到语言给予的“恩惠”，批评方法论的变迁动摇更多是文学语言之外的东西，从未对语言本身产生过不良企图，反而更依赖对语言的解读。因此可以说，某种意义上针对文本展开批评的各种新思潮或许重新复归到了文学本身，“因为它笨拙地给自己掺进了某种经验主义，即这样一种信念：诗的话语已经以某种方式在自身之内‘包括’了现实。”^①理论家们往往更看重直觉的本质性的力量，摆脱文学之外的惯性干扰，从而更加彻底地认识了语言对文学的真正贡献。不妨如此明确语言的定义：语言即意义本身。仔细辨别后会发现，文学的审美力量，文学吸引读者的焦点，并足以维持审美持久性的东西就是语言本身。意义是时代性的历时性的产物，如果脱离了语言的充分支撑，意义的生命力迟早面临枯萎。

语言对意义的重要性——此处称谓的“意义”原则上唯指广义上的“理性的审美的意义”，因为审美是无边界的彻底释放的场域，其他层面的意义则深受各种因素的局限——可以从反向的角度来理解语言与意义的同质关系。一个典型的文本阅读体验是，由于痴迷于语言自身的审美体验，往往因此而忽略作者自身想要表达的审美意图，这是个很奇怪又很丰富的现象。甚至，文本审美的接受可以超脱作品整体性的意义框架，而随时随地介入其中，无论作品自身的意义或者叙述秩序都已不再显得举足轻重，因为审美体验直接获取于语言自身。文学批评的历史本质上乃是审美的变迁史，这个过程亦是文学摆脱非文学意义干扰的过程，使得文学从最初的语言性的技艺出发复归语言性的评价，这一整体趋势对当下文学的态度亦值得重视和借鉴。对非文学因素的过度倚重，赋予文学超负荷的负担，将不必要的人为的意义价值体系转嫁于文学，并企图强制性地将其融为一体。然而，事实终将证明此乃严重的失智之举，先锋文学的企图重新崛起就带有此种嫌疑。需要重申的是，无论何种文学思潮，如果单纯地追求意义的价值而忽略语言自身的理性，则注定结果将是令人失望的。某种意义上，文学留给人们的唯有语言本身。同样，意义对语言具有反作用，两者的关系是动态辩证的，两者之间存有隐形而广阔的“审美间隙”，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陈颖）

^① [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